

红

旗

飘

飘



21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

21

旗

飘

飘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红旗飘飘 (21集)

本社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5印张 2插页 205千字

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0月山东第2次印刷

印数 46,001—56,000册

定价 13.10 元(平)18.10元(精)



目 次

对周总理的片断回忆	师 哲	1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回忆敬爱的朱总司令	余洪远	14
难忘的教诲		
——缅怀董必武同志	曹 瑛	29
崇高的革命情谊		
——悼念彭德怀同志	李志强	43
英名长留天地间		
——我所认识的贺龙同志	马识途	60
鄂中的烽燧		
——忆陶铸同志主办汤池训练班	雍文涛	93
忆罗瑞卿同志	任白戈	112
优秀的将领 战斗的一生		
——回忆徐海东同志	郭述申	119
职业革命者		
——忆林枫同志	郭明秋	130
奋斗终生		
——忆谢觉哉同志的晚年生活	王定国	152

忆早年的立三同志	罗章龙	164
学习范文澜同志	荣孟源	171
共同战斗的岁月		
——回忆陈正人同志	彭 儒	177
战斗在赣水那边		
——曾山同志在江西革命活动纪事		200
闪光的片断		
——忆何伟同志	孙以瑾	210
骡子的故事		
——忆长征途中的陈伯钧同志	谢 良	226
一位老海员的战斗历程		
——忆陈郁同志	刘 政 整理	233
良师益友		
——忆皮定均同志	铁 坚	252
爸爸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小平 志强 兰平 小燕	261
老革命讲故事		
毛主席、朱总司令同我们一起插秧	胡安吉	270
总理理财	白士俊	274
理发记	陈友生	278
“虎口”数牙	何德全	282
杀“猪”过年	贺东生	287
一坛银元	阎之青	292
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	曾敬凡	294
封面画：丙辰潮	严云开 作	

对周总理的片断回忆

师 哲



周副主席，周总理，我们历来这样尊敬、爱戴地称呼他。威武大将军，我们参加过军的人，一向这样钦佩地称呼他。有时我们也直呼恩来同志，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以前，一般都是这样亲热地称呼他。不管人们怎么称呼，他在我党内外和人民中间素来都受到极大的信任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列主义者、人民的好总理。

不知疲劳 顽强奋战

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周恩来同志总是以高昂的革命斗志、超人的顽强毅力、喷泉般的充沛精力，日夜操劳、奋战不已。有时竟然几天几夜不休息，不睡觉，紧张、繁忙、连续地工作。实在困倦、难以支持的时候，他也只是靠在椅背上蒙眬片刻，便又精神焕发地继续工作下去。而在工作任务完成之后，他也善于抓紧时间，利用

机会,采取灵活的方法,好好地休息一阵儿——无论在火车上、汽车上、飞机上、沙发上,只要是能躺下休息的地方,他都可以立即入睡。记得是一九三九年底——一九四〇年初在莫斯科,我第一次陪同周副主席工作,那时我还不熟悉他的工作方法和生活习惯,只是想到应该时刻陪着他,没有料到他竟会几乎三个昼夜不停地工作下去。我虽然也曾利用空隙稍事休息,但在三天工作任务完成以后,就已经精疲力竭,头昏脑胀,简直不能设想我自己成个什么样子了。而周副主席经过一昼夜的休息,依然是一位神采奕奕、精力充沛、顶天立地、战斗不息的威武大将军,的确使人望尘莫及,叹服之至。

周副主席经过长途跋涉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央领导核心不断举行会议,听取他的汇报(他这次带回来一些为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所重视的有利于我国革命和坚持抗战的好消息),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重新进行了调整和安排。他在延安一完成工作任务以后,又立即带一批干部到重庆去了。

仅仅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四月,还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光拿他奔波的路程来看,几乎等于绕地球半周,而他完成的工作量,如果由别人来做,我想至少也需要两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行。

惊人的记忆力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我在莫斯科遇见周副主席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在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的孔采伏野营里,他给我们部分军校学生作关于“六大”的传达报告。他讲的时间很长,很详细,从下午六、七点左右一直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但没有人觉得疲劳困倦,都是聚精会神地

倾听者。由于第二天清早恩来同志就要回莫斯科城里去，所以散会后，一些人还围着他，要谈谈自己的问题，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要求回国工作，而且已决定送我回国了。他答应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中共代表团里去研究，统一解决，统一安排，然后分别通知大家。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又把我留在苏联工作了。令人十分惊奇的是，事隔整整十一年，一九三九年我们再次相遇，当我提起往事时，他居然还能回忆起来，并给我解释了当年处理那些问题和中共代表团作出决定的经过。

总理记忆力之强，的确是惊人的，超人的。那时在许多谈话、会谈、谈判的场合，很少作记录。但他对谈话的经过、细节基本上都能记住。他回忆起来，往往比我们做翻译工作的人还更清晰、更准确。

我常常听到周总理对许多以往的问题和人事的回忆，总是讲得有条有理，活灵活现，就象是昨天才发生和经历过似的。有一次，在一个十分隆重的大型宴会开始前的几分钟，总理口授了他将要在宴会上讲的一段较长的祝酒词，叫我们先用外文记下来，以保证翻译质量。当时我们马上准备好了译稿，至少也有五百字。在宴会上祝酒时，总理手上并无文稿，但他讲的同他事先口授的词句，一点也不差。这种非凡的记忆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大智大勇 先声夺敌

一九四〇年二月下旬，我们一行十人，随从周副主席由莫斯科返回延安。在途经国民党统治区时，周恩来同志战略上蔑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相结合，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与细致入微的组织安排相结合，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与斗争方式方法的灵活性相结合，充分显示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巧妙的斗争

艺术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当我们乘坐苏联飞机抵达阿拉木图，快要踏上祖国领土的时候，恩来同志就提醒和教育大家，进到国民党统治区后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当时统治新疆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盛世才。他伪装进步，采取各种方式表示他对共产党的同情和好感，我们抵达乌鲁木齐后，盛世才对周副主席殷勤款待，但周副主席决定我们一行都下榻在以陈潭秋同志为首的我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代表团的驻地。他又详细安排了集体活动计划，明确规定了应当遵守的准则；进一步说明进入内地时，大家应该注意的事项；还根据每个人的身分和具体情况，分别给我们起了姓名，如“林吉”、“王大才”等等。我的名字“师哲”也就是这时他给取的。同时，周副主席也充分利用了当时新疆的形势，跟盛世才周旋了几天，替我们驻新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干部和学生解决了一系列的迫切问题。（对后来盛世才撕去画皮，背信弃义，公开踏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也估计到了。）

我们的第二站是兰州。飞机刚一降落在兰州机场上，一个国民党的上校军官带领一批人走近飞机，准备检查和登记，气氛相当紧张。周副主席沉着冷静地坐在机舱里，叫我先下去看看形势。我走下飞机，向那个上校说明：“机上是周恩来先生、他的家眷和随员。”那个上校立刻肃然起敬地声明说：“我是周先生黄埔时期的学生，我欢迎我的老师！”周副主席走下飞机，他趋步上前，简直象是向恩来同志汇报似的，介绍了一番他们的情况。既未登记，也未检查，只问了一声：一行若干人？然后就要用他们的汽车把我们和行李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我们谢绝了他，因为伍修权同志早已准备好用自己的车子接我们到办事处去。在兰州，周副主席又替大家作了周密的安排。不仅关心大家的政治安全，连大家的生活和行路中应当注意的细小事宜，如购置被褥、被单、面盆、口杯等日常用品，以至一块油布、一根绳子等等，

他都考虑过了，安排到了。并且总是再三叮咛要大家备齐，以免在路上发生困难。他对每个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对每项事情的合情合理和恰如其分的组织安排，令人既感激又敬佩。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向他学习的强烈愿望不禁油然而生。人们心里常常想：“做事，处理问题，能象总理那样全面周到，精心安排，合情合理，迅速妥当，该有多好呀！”在兰州，周副主席同样进行了广泛的活动，跟当时的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家骅打交道；同苏联驻兰州总领事进行长谈。朱家骅还派了一辆大型旅行车，把我们一行送到延安。

路过西安时，周副主席仍然下榻我八路军办事处。除了安排我们自己的事情外，还得同陕西的国民党头头蒋鼎文之类周旋。这时，他们在“阎王殿”上虽然装得任人看不出什么来，却在背后指使小鬼们闹翻了天。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屋前屋后，附近的大街小巷，以至门前空场上，都爬满了蛆虫——伪装掩饰、花样百出的特殊人物。他们日夜在办事处周围窜来窜去，但鬼鬼祟祟的行径，总是能被人们识破的。人们都知道，正是敬爱的周副主席，在那一九三六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肩负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不畏艰险，毅然率领我党代表团，从陕北日夜兼程驰赴西安，使问题得到了和平解决，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就是这位鼎鼎大名的伟大人物，正当国共联合抗日的时候，从苏联治病回来，路过西安，竟被国民党当权者们视为危险人物，谈虎变色，胆战心惊，兴师动众，如临大敌，丧心病狂地施展种种鬼蜮伎俩，钉梢、尾追、监视、捣乱……这不仅说明他们忘恩负义、敌我倒置的流氓本色，而且暴露了他们背叛民族利益、媚敌卖国的真面目。周副主席藐视群丑，应敌妙策早已成竹在胸，更兼他的声誉威望已经深植在亿万人们的心中，国民党的几个反动头

目也只能落得丢人现丑而已。西安西门那时有国民党一个整营的兵力在把守，周副主席的车子开出西门时，他们的营、连长都走了出来，森严戒备。大概他们早已得到通知，八路军的车队将要通过，看样子是要认真盘问、检查、留难一番的。但当我们告诉他们这是“周恩来先生的公车”时，那些营、连长马上立正敬礼，面带笑容地注视着车内，既是表示敬意，也是想瞻仰周副主席的丰采。他们连护照都没有看，也不再问什么，站在一旁，恭送车队通行。周副主席的车子到了洛川县城，夜宿在一家小饭店里。大家因一路劳累，早就休息了。在十一点半钟的时候，突然，一个国民党官儿和几个随从打着灯笼前来“拜访”，自我介绍说：“我是黄埔军校时期周先生的学生，现任洛川县长，要求拜会周先生。”因为我们都已休息，所以在做了一番必要的“安排”之后，才让那位县长进来。周副主席当然记不得他了，他却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往事，还谈了不少的客套话，然后告辞而去。不管他的拜会、恭迎、敬佩究有几分诚心，或全属假意，周副主席在国民党中下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是极深的，威望是很高的，人们敬仰他、钦佩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处处事事 以身作则

当周副主席的车子驶过介子河，进入我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茶坊时，情况和气氛就完全变了，真是两个天地、两个世界。人们一齐涌向我们的车子，团团围住副主席问寒问暖，热情交谈；稍事休息后，还一块玩了篮球，根本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群众，谁是战士，谁是指挥员。那个热烈场面，使我这个初次见到我们亲人的人，楞楞地看得出神，内心里交织着激动、喜悦、惊愕的复杂感情。当车子继续前进到可以望见延安宝塔的地方时，周副主席指示，所有的车辆一律开到七里铺八路军兵站，在

那里登记、受检查，并由兵站负责安排，把所有人员分别送到有关单位去。兵站的负责同志以敬重关心的口吻说：“副主席的车子不必登记检查，可先开走，快点回机关休息去好了！”周副主席却坚持一定要按规章制度办事。他的车子停留的时间最长，直到全部登记、检查、分送人员的事情办妥后，他才放心地让自己的车子最后驶出兵站。我对他为什么非要在兵站办理登记、检查手续，不把车子直接驶进中央机关的事，不很理解。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你作为党中央和军委副主席，难道不可以把车子直接驶进中央机关吗？”他很耐心地解释说：“我们自己制订的纪律、规章制度，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执行，那还怎么能要求人家去遵守执行？同时自己制订的制度，如果自己也不去执行，那么制订制度又有什么用处？再说，我们的车队运来那么多人，是我带到延安来的，怎能不关照、安置他们，而自己先乘车离去呢？”这段意味极其深长的话，道出了一条马列主义真理——在无产阶级的纪律制度面前人人必须平等。周副主席的上述言行，使我牢记至今。

时刻不忘毛主席

我们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远方”（这是过去我们对共产国际的代称）给大家准备了两大箱旅行食品，如奶油、乳酪、各种罐头、饼干，以及水果糖、巧克力、烟、酒等等。但在旅途中，恩来同志建议大家一概放弃西餐，改用中餐。对这个建议大家自然都是拥护的，然而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办，心想把这些东西带到延安去，岂不是等于背着石头进山吗？！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清晨，周副主席亲自检查了食品箱，然后对我说：“把这两箱食品交给警卫员，转送到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地）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心里时

刻想着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啊！

一天，周副主席要我同他一道去杨家岭拜会毛主席。这天，毛主席正为张鼎丞同志夫妇设晚宴，庆贺他们的新婚。我们也参加了晚宴。晚宴后，周副主席陪同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一道到中央礼堂（后来称为中央党校礼堂）去看电影。看的是《列宁在十月》。影片和小型放映机都是周副主席从苏联带回来的，并且由他亲自放映，要我做翻译解释。这件小事，同样反映出他对毛主席和革命同志们具有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和革命友爱啊！

人们愿意向他讲出心里话

我永远忘记不了周恩来同志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可尊可敬的形象；关心他人，诚恳热情，平等待人的作风；神采奕奕，富于魅力，泰然自若的政治家风度。跟他在一起工作、生活，永远不会感到枯燥、寂寞，更不会感到拘束、畏缩。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来关心和帮助同志改造思想，提高认识，排除困难，解决问题，也常常给人讲些趣闻轶事、有兴味的故事、意味深长的笑谈，引逗年轻一辈把自己的小事或愿望向他倾诉出来。这时，他既能给你提出美好的建议来解开你的思想疙瘩，让你豁然开朗，朝正确的方向去想问题；又善于帮助你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如果同周副主席相处的时间长了，互相都熟悉了，那他更会无所不谈。这些谈话不论涉及什么问题，采取什么方式，其内容总是含有启发诱导的教育意义。在四十年代，周副主席经常来往于延安和重庆、南京之间，延安的同志都希望他多回来几次。因为那时，每个同志无不关心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同这方面有关的各种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周副主席是享有最高权威的，所以他每次回到延安都要给大家作报告，解答同志们提出来的大量问题，澄清不少的疑问，鼓舞人们充满昂扬的斗志，增强前

进的毅力和坚定胜利的信心。

周副主席对同志们一向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人们对他也向来敢讲实话，愿意讲心里话。一九四八年夏，一位同志在工作中违背了中央决定的精神，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苦闷了好多天，不知所措。后来鼓起勇气，去找周副主席，老实讲了自己的问题，承认了错误，但仍怕中央知道，要求替他圆场，并且替他保密。周副主席冷静地审查了他的问题，弄清了实质，指出他绝对不能对党掩饰自己的错误，而是应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否则就会错上加错，并向他进一步启发、教育，终于使他解除了顾虑，放下了包袱，愉快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而以后他的工作做得是比较出色的。我还注意到，周恩来同志不论是在什么场合，不论是谈论什么问题，也不论交谈的是同志，是朋友，还是与他交锋的敌人，在交谈中即使可能发生激烈的争论，但在最后，对方总是口服心服，感到心情舒畅，似乎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极少出现对立僵持的难堪局面，任何人也讲不出愤愤不平的气话来。那么，他的这种通人心灵的钥匙和感召人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我长期以来总想从向他学习中探索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得到的结论首先是：他待人以诚，处事客观，通情达理，谦虚谨慎。可能有人会说，这几句话，我们是天天挂在嘴上的，有什么稀奇？我说，不错，天天挂在嘴上而永远不见诸实行，只是把它做为进行宣传的伟大空话，那的确算不了什么。但我所说的，是从周恩来同志的生平活动、现实言行中总结出来的，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了。我的这几句话，仅仅是就周恩来同志待人接物这一方面而言的，决不是对他的全面评价。而他的修养、品德、作风也绝不是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得了的。然而他在与人们相处共事当中，正是这些高尚品质，感人至深，从而使人们信赖他、服帖他、顺从他。或象一个外交人士说的那样：“我本来

想要在与他(周)的交锋中赢得上风，但末了，却成为他的‘自甘情愿的被征服者’。”

“革命的骆驼”

周恩来同志的功勋、贡献、学识、才能，尤其是那高尚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无论在党内党外、国内国际，都是素孚众望的。

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常常深入基层，同中下级干部一起搞集体文娱活动，或闲谈聊天，讲故事。有一次，在蓝家坪一个干部的窑洞里，恩来同志参加了这种闲谈聊天的座谈会。一位同志把这种座谈会滑稽地称作“废话公司”。另一位同志反驳说，虽是废话，但也是有益于身心的良言佳话。恩来同志插话说：“一切都是辩证的，而辩证观点是革命的。”在交谈中，另一位同志说：“我仔细研究过骆驼的性格和能耐。它的特长是具有高度的顽强性、坚韧性，能吃苦耐劳，能忍饥忍渴，有高强负重力和牵引力，能超越最难跋涉的戈壁沙漠，能抵御狂风暴雨，有抗寒、抗病、抗疫能力，能团结拒敌，直至获胜。骆驼被誉为‘大力士’，也不愧为‘沙漠之舟’。但它又从不哗众取宠，总是默默然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地为人类效力。在诗词中，对骆驼也有过不少赞誉，但它在历史上对人类究竟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至今却还没有一个比较全面公正的评价。”最后他说：“恩来同志，你就是我们党内、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恩来同志马上回答说：“不，只是一头毛驴子。”于是，大家又纷纷议论起来，说：“毛驴子在陕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即使在革命战争中，对支前和交通运输方面，毛驴子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只是人们一般不注意、也不想这些问题。因为它为人类服役已习以为常了，所以就不考虑、不注意它对人类的贡献，也就谈不上给它作出什么合理的评价了。然而劳动人民是知道的，

心中是有数的。”这时，有一个同志激动地站起来说：“我自觉有愧于心的，至今还起不了毛驴一条腿的作用。”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应努力向恩来同志学习，加强锻炼，使自己坚强起来，能为革命挑起较重的担子！”

其实，远在二十、三十年代，我在外国早就多次听到过人们对周副主席的称赞：“周恩来同志在工人中间，特别是在上海，在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受到无限的尊敬和仰慕。”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恩来同志在莫斯科住院治疗期间，许多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同志，自然都希望他安心治病，好好休养，但又热切地盼望着同他早日见面，听取他带来的好消息。共产国际的相当一部分负责人和高级干部自然早已知道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住院治疗。其他许多人虽然还不知道他已经抵达莫斯科，但对他的名字却是久已熟悉的，而且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里唯一有领导地位的人；他所代表的党、人民、武装力量以及他本人所威望是举世敬仰的。不少的人悄悄地向我打听：“周恩来同志吗？什么时候会来国际机关？真想看看他！”有一位天津青年妇女还要求我事先告诉她：周恩来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经过，以便她能隔着玻璃窗望他一眼。可见恩来同志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之高了。恩来同志在医院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出院，就立刻投入了异常紧张繁忙的工作。他有时偶尔在共产国际办公机关的大院里散步，也到机关大饭厅里去用餐，又多次参加过各种各样的会议。在出入厅、院，经过走廊时，人们看见他就向他问好致意，有的人笑脸相迎，有的人还要跟他攀谈几句。恩来同志总是和蔼可亲、诚心诚意地应酬每一个人，很快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印象。直到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到莫斯科、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东德时，偶尔遇到当年的熟识者，他们总还要

回忆以前在莫斯科同周恩来同志相识和交谈的情况，并关心地询问他的健康、工作与社会活动情况，有些人还谈到恩来同志对他们的帮助和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还记得周副主席当年给他们讲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和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抗敌战争，也许记得我曾经给周来同志做过翻译的缘故。记得在罗马尼亚和捷克都碰见过这样的人，他们说：当年（指三十年代）他们对于在中国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总是弄不清楚，认识不了它的奥妙，摸不准它那迂回曲折地发展的来龙去脉。直到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和讲解后，才基本上弄明白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彻底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中，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曾给了他们很好的借鉴。共产国际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等人后来都曾回忆过周恩来同志。特别是德国的皮克，自一九五〇年至五六年每次遇见周总理时，总要表示他熟悉周恩来，也总要赞扬周总理是一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每次会见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时，他也总要提到周恩来同志，而且有时对着中国同志举手高喊两声：“周恩来！周恩来！”我当时不能理解皮克所以这样做的全部意义，但给人的印象，好象“周恩来”这个美好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德人民之间的友谊。

最理想的总理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按照他的反革命预谋，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矛头直指革命圣地——延安。周副主席先是陪同毛主席在延安坚持工作。在敌人进攻延安的前夕，他争取时间到后方去巡视，及时地整顿了后方机关的工作，并作好了人事安排。从而使后勤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发挥它应有的效